

# Cauh Sawcuengh Caeuq Sawcuengh Doiq Hoiz Gun Baenz Cuengh Miz Maz Yungh

## 拼音壮文的创制及其对汉壮翻译的影响

□ 黄青霞

**[摘要]** 现在我区推行的壮文是以壮语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壮语武鸣音为标准音的拉丁化拼音文字。本文梳理了拼音壮文的创制过程,试从翻译等角度对其优势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汉壮翻译; 壮语; 拼音壮文

### 1. 壮语调查及拼音壮文创制过程

壮族人民有使用文字进行记录的需要,但是古壮字很难广泛使用的缺点促使壮族地区的人民思考如何创制出一种更科学系统更方便使用的文字。

早在193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方桂开始研究壮语。他曾到到南宁搜集壮族语言材料,写成《武鸣土语》,采集中越边境上的龙州壮语,写成《龙州土语》。这些著作被誉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开山之作”。李方桂因此被称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1948年,广西壮族青年曾提出创制拉丁壮文的设想;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韦庆稳、农绍亮等人草拟了一套拉丁壮文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民族团结,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为了指导和组织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1951年2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根据政务院的指示,1951年10月12日,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1)指导并组织有关机关、团体及个人进行少数民族语文的调查、研究及文字的创制、改革和充实等工作;(2)商讨并拟订有关机关工作的分工及合作的办法。”新创壮文的工作开始提上日程。

1952年2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派出了3个工作组分赴广西、川康和云南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广西的壮语组由袁家骅、韦庆稳、张均如组织开展调查。

在广西民委的大力支持下,壮语组在南宁开设了一个壮族语文训练班,培训由广西各地派来参加调查工作的学员。训练班结束后,工作组便着手对壮语南北方言的部分地区做初步的调查。3个月后,工作组拟订了第一个壮文方案,并编写了教材。随后,工作组用这个壮文方案开始做教学试验,并且提交了《一九五二年壮族语文工作报告》。

在1952年的调查和试点中,专家们认为:目前壮语区域要选择一个中心地点的方言作为标准来制定拼音文字,是太勉强的硬性办法。制定互相汇通的两个文字方案,才能兼顾南北壮语的全面。(袁家骅:《广西壮语方言分布概况和创制文字的途径》,《中国语文》,1952年12月。)这次调查为1954年开始的壮语普查和壮文创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54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召开第二百一十七次政务会议,批准了罗常培所作的《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并决定撤销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负责关于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文字的工作(包括语言调查、文字设计等),少数民族文字方案的确定和工作中的其他问题,由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政务院对《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的批复,经过审慎研究后,决定首先在壮族中试行创立文字工作。1954年5月30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由罗常培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听取壮族人大代表关于创立文字的意见。

1954年8月,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壮族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后改称“壮文工作委员会”)。不久,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再次派出壮语调查组,由袁家骅任队长,罗季光、王均为副队长,韦庆稳、张均如、欧阳觉亚、吴冠仁、梁敏等为队员。鉴于壮语的复杂性,壮族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与壮语调查组决定组成壮语方言调查队,并兵分北、西、南路分赴广西各地进行调查。

调查队从1954年9月至1955年1月,一共调查了49个县54个点的壮语方言材料,还搜集了壮族社会的交通、地理、风俗等方面的数据。调查队以搜集到的材料为基础,对各地壮语的语音、词汇进行了比较研究,为选择壮文方案的标准音点进行论证并进行实验教学。

1955年5月末,广西壮族文字问题座谈会南宁举行,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傅懋绩教授和苏联派到中国的语言学家格·谢尔久琴柯专程参加会议,同广西的领导、专家和壮语方言调查队的同志共商壮文方案的创制。1955年11月11日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将《壮文方案》(草案)上报,并将其公布在1955年12月11日的《广西日报》上,以征求群众的意见。为进一步总结群众意见,考察新创《壮文方案》的使用效果,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再次组织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由袁家骅、罗季光、王均、严学容率领的第一工作队,继续到广西对壮语进行调查研究,并派出人员到云南文山,对壮族聚居地的10多个壮语点也进行了调查。通过总结群众意见和试验教学,工作队对《壮文方案》进行了完善。1956年7月17日《壮文方案》(草案)经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通过并再次上报。1957年11月29日国务院第六十三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讨论壮文方案和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的报告》,批准了《壮文方案》(草案),并同意在壮族地区推行使用。

此后,专家学者们又对《壮文方案》进行了进一步完善,1982年4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了《壮文方案》(修订案),这套拼音壮文方案通行至今。

### 2. 壮文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点问题

在《壮文方案》创制的过程中,壮语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客观存在的差异使得壮文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点成为一个难以取舍的问题。

标准音是一根标杆,它标志着语言的中心地位,体现语言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在人们心理上凸显这种语言的“正规性”。它是外地人学习这种语言的指导,是本地区内部交流时的参考,有利于本地区不同方言人群相互理解,代表着语言向心力的方向。基础方言则是标准音的基础和主要来源。

1952年的第一次实地调查研究中,专家们认为:各地壮语方言确实差异较大,与此同时,壮语区域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农村经济状态,还没有形成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要选择一个中心地点的方言作为标准来制定拼音文字,是太勉强的硬性办法。认为制定南北互相会通(指同一字母代表同样的或相当的音位或音素)的两个文字方案,更能兼顾南北壮语。

为创制壮文而进行的第二次调研结束后,1955年5月27日至30日,在傅懋勤先生和苏联顾问格·谢尔久琴柯先生参与的广西壮族文字问题座谈会上,袁家骅先生提出壮文设计南北两套拼音文字方案的建议,但遭到与会的壮族代表的反对,认为一个民族搞两套文字不利于民族内部的交往和团结。

格·谢尔久琴柯先生起先也同意袁家骅先生的意见,后来他看了专家们整理的材料并考

虑大家的意见后说,苏联是把标准音跟基础方言分别处理的,标准音只管语音,只取一个点,词汇则依从基础方言,所以基础方言要选取代表性的方言区。这样,矛盾就解决了。(李旭练:《王均先生访谈录》,《中国民族研究年鉴·1999年卷》,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

到底选取哪个地区为基础方言区,结合南部方言的特点,专家们认为北部方言语音差别较小,使用的人数占了壮族人口2/3,因此将北部方言定为基础方言。标准音的选取上,应该从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去考虑。谢尔久琴柯认为:“考虑的主要是文化、政治条件,而经济条件不是直接规定语言发展……中心地点有很多学校,培养着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由于社会的需要,中心地区现在没有铁路的地点,比方武鸣吧,将来也会有的。这些条件决定了标准音应以中心地点为准。”(谢尔久琴柯:《关于创立民族文字和建立标准语的问题》,民族出版社,1956年10月。)在考察了柳江、来宾和武鸣等地的情况后,武鸣县双桥镇的方言被选中,成为壮语标准音。

广西壮语大体以右江—邕江一线为界分南北两大方言,武鸣地处邕江北岸广西壮语南北交界处,靠近南宁,属北部方言,但和南部方言近在咫尺。从政治、经济和地理位置综合考察,武鸣县双桥镇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地区。同时,为了新创壮文的适用面,方案把武鸣壮语的复合韵母bl-、ml-、gl-换成by-、my-、gy-,并增加ny-声母和ei、ou两个韵母。这样,壮语的标准音得到了确认。

### 3. 壮文创制的意义

壮文的创制对于壮族人民、壮族文化乃至中国的文化多样性都意义重大。

拼音壮文让没有汉字基础的壮族人民记录、阅读壮语材料成为可能。目前的壮族偏远地区仍然存在不熟汉语、不识汉字的公民。拼音壮文强于表音,让他们可以通过识记字母和发音的对应关系学会书写和阅读壮文。现存壮文古籍基本都是以方块壮字进行书写,用拼音壮文转写以后这些古籍也可以让不认识方块壮字的人阅读、研究。作为一种文字,壮文突破了空间的限制,让壮语可以传到远方,不同地点的人们可以通过文字材料传达和获取信息;壮文突破了时间的限制,让壮语信息可以被记录下来,不能口口相传的时候也能传达信息。自拼音壮文创制以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先后出现了以壮文出版发行的《广西民族报》和《三月三》杂志,民族出版社和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政府工作报告》《赶圩歌》《节日》等壮文书籍,很好地发挥了壮文作为文字工具的基本作用,也丰富了壮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拼音壮文的出现有利于提升民族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绝大多数都需要通过语言来代代传承。作为壮族文化发展和传承的载体,壮文让壮族文化成果更加精密,更加系统,流传更为久远。它的系统性、规范性和科学性都是方块壮字所欠缺的。壮文登上了人民币,登上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政府机关的牌匾,也登上了南宁市的地铁站,很好地体现了壮族文化的存在感。

从汉壮翻译的角度来说,相对于方块壮字,拼音壮文也有很大的优势。拼音壮文使用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是目前世界上流传最广的字母体系。在电子输入越发成为主流的今天,使用拉丁字母在输入、排版、传播和出版中具有很大的便利性。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完成壮文的输入和修改。基于通用的英文字母就可以完成壮文的输入,不需要借助额外研发的输入法就能输入和展示壮文。从译文的读者角度来说,壮文作为一种拼音文字,读者只要学会字母和拼读规则,就能看着壮文字句读出它们的发音,如果会说壮语,知道发音自然就能知道字句的意思。这就自然降低了对读者的门槛。

壮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壮族文化丰富了中国文化。在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世界文化有趋同的势头,各地区方言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形势越趋严峻。物种多样性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拼音壮文的创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成果,是中国民族政策的一种体现,既增强了壮族人民的向心力,也增强了壮族人民对壮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拼音壮文可以快捷地完成国家重要政策方针和文件的翻译,将中央的指示及时传达给壮族人民。另外,拼音壮文的创制也为其他民族创制文字提供了借鉴和启发。每年“两会”期间各民族的委员和代表们身着民族服装,这已经成为“两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包容性和优越性。在需要拉动内需,发展第三产业的背景下,保护和开发利用民族语言文字资源,在旅游行业中利用好民族语言文字创造经济效益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1] 广西省壮文工作委员会.壮文工作参考资料第一辑[C].南宁: 1957.
- [2] 李旭练, 黄泉熙, 黄如猛.壮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N].广西民族报(壮文版), 2002-12-18—2003-1-22.
- [3] 李旭练.王均先生访谈录[C].中国民族研究年鉴·1999年卷,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 [4] 梁敏.壮文方案的历史沿革[C].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28-36.
- [5] 零兴宁.壮汉双语教育辉煌六十载[Z].  
[http://www.gxmzb.net/content/2017-12/19/content\\_23264.htm?from=timeline](http://www.gxmzb.net/content/2017-12/19/content_23264.htm?from=timeline).
- [6] 陆晓荔.广西壮汉双语教育现状调查[J].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 2011(6).
- [7] 王均.壮文创制和修订中的若干问题[J].民族语文, 1982(5).
- [8] 韦纯束.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切实抓好推行壮文工作(1984年8月19日在全区壮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R].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推行壮文文件选编, 南宁: 1990: 34—44.
- [9] 韦庆稳, 覃国生.壮语简志[M].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0.
- [10] 韦庆稳.壮文工作的回顾与前瞻(未刊稿) [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印, 1979.
- [11] 谢尔久琴柯.关于创立民族文字和建立标准语的问题[M].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56.
- [12] 袁家骅, 罗季光.选择僮族标准语基础方言的经过(未刊稿) [C].北京: 民族语文学科讨论会印, 1955.
- [13] 袁家骅, 韦庆稳, 张均如.一九五二年壮族语文工作报告(语言学专刊) [M].北京: 中国科学院, 1953.
- [14] 袁家骅.广西壮语方言分布概况和创制文字的途径[J].中国语文, 1952(12): 5-7.
- [15] 袁家骅.壮语问题[J].中国语文, 1954(5): 12-15.
- [16] 张恩享.壮语调查话当年[J].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 2005(5).
- [17] 张声震.在全区壮文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R].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推行壮文文件选编, 南宁: 1990: 45-52.

(作者单位系广西民族出版社)